

目 录

第十六卷

社会科学

严复先生及其家庭	严家理(1)
略谈辜鸿铭	沈来秋(6)
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	黄伯易(11)
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	张中府(17)
历朝通俗演义作者蔡东藩	蔡福源(21)
符定一治学小记	马念祖(28)
忆父亲马寅初二三事	马本寅(31)
记谢无量先生	王云凡(37)
理财专家杨端六	杨宜福(40)
忆恩师沈兼士	葛信益(45)
历史学家陈寅恪	胡守为(48)
我和胡适的交往	贺 麟(56)
胡适之先生逸事	魏际昌(59)
我的父亲赵元任	赵新那(66)
经济教学改革的回顾	何 廉(75)
邹韬奋的早年生活	沈粹缜(83)
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	邓广铭(89)
美学家朱光潜	郭 因(93)
我的大半生	商承祚(124)
回忆萧一山先生	冯国定(132)
追忆裴文中	舒令满(135)
回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 的发现	裴文中(142)
我的祖父陆宗达	陆 昕(146)

治学五十年回顾	任访秋(153)
怀念艾思奇同志	金 丁(162)
林白水遇难前后	林慰君(165)
史量才先生之生平	黄炎培(182)
史量才在 1932 年	马荫良(184)
一代报人邵飘萍	汤修慧(191)
我和飘萍共同生活的七年	祝文秀(203)
我所认识的张季鸾和 胡政之	李侠文(206)
向着明天——怀念韬奋	史 良(214)
杜重远和邹韬奋的友谊	沈粹缜(216)
七七事变以后我的经历	顾执中(218)
往事的回顾	刘尊棋(234)
我的翻译之道	姜椿芳(253)
辛亥革命前后的武汉报刊	扬 铎(263)
《新闻报》发家史	陶菊隐(267)
《大公报》与胡政之	曹世瑛(278)
旧《大公报》坐科记	孔昭恺(295)
我所知道的湖南《大公报》	张平子(323)
我在天津《益世报》时期的风风雨雨	罗隆基(336)
回忆天津《新民意报》	刘嘉谟(346)
邵力子与《民国日报》	徐铸成(353)
北京的第一家晚报	李适时(356)
《新民报》二十年	陈铭德 邓季惺(362)
胡健中和《东南日报》	王遂今(400)
抗战时期的《中央日报》	王抡枢(409)
我在福建《中央日报》的 经历	郑万水(412)
抗战时期的北战线《阵中 日报》	陆印泉(419)

- 《群众》周刊在香港的奋斗……林默涵(424)
- 三十年报界见闻……余靖(427)
- 1927年至抗战前的天津新
闻界……俞志厚(437)
- 抗战初期外国记者在重庆……陈云阁(451)
- 战时武汉的中国青年记者
学会……冯英子(454)
- 1944年中外记者团延安
之行……张克明(457)
- 萧同兹与中央通讯社……黎宗烈(466)
- 金陵刻经处……徐平轩(474)
- 漫谈商务印书馆……章锡琛(488)
-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朱蔚伯(509)
- 我在商务印书馆四年见闻……卢天白(518)
- 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陈铭枢(526)
- 在中华书局当练习生的
情景……朱联保(538)
- 沈知方与上海世界书局……陈于德(540)
- 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与世
界社……李清悚(542)
- 记开明书店……章克标(545)
- 回忆龙门书局……严幼芝(555)
- 生活书店见闻……王大垣(559)
- 新知书店在桂林……沈静芷(566)
- 唐纵与中国警政出版社……陆印泉(573)
- 北京图书馆的变迁……赵其康(576)
- 解放前的河南省图书馆和
馆长井伟生……井其忠(586)
- 云南图书馆见闻录……于乃义(591)
- 回忆安徽省立图书馆……蒋元卿(601)
- 柳亚子与上海市通志馆……胡道静(607)
- 隆福寺街的旧书业……葛鸿年等(613)
- 清内阁大库档案流散记……单士元(616)
- 山西省旧档案的烧毁……王尊光(619)
- 忆文物收藏鉴赏家张效彬……徐士瑚(621)
- 记古钱学家郑家相……郑舜华(626)
- 我所知道的张伯驹……张琦翔(632)
- 集钞五十年杂忆……吴寿中(637)

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的文物

- 清理……王世襄(646)
- 龙门石窟见闻……吴圭洁(654)
- 北京中山公园沧桑……刘一峰(656)

科学技术

- 地理学家白眉初……张艾曼(664)
- 近代水利科技先驱者李仪祉
先生……李赋都(669)
- 林业界的一代师表
——梁希……张楚宝(673)
- 飞机制造专家
巴玉藻……巴吟轩 巴钟奇(681)
- 生物化学家吴宪……吴景略(685)
- 毕生致力科学、教育事业的
辛树帜……姜义安(688)
- 杨石先自传……杨石先(695)
- “当代茶圣”吴觉农……冯和法(698)
- 中国遗传科学的奠基人
——谈家桢……杨竹亭(708)
- 我的小传……林同驊(717)
- 中国科学社简史……任鸿隽(721)
- 忆中国工程师学会……茅以升(731)
- 中国天文学会和北京古观
象台……陈遵妫(740)
- 抗战期间的重庆“自然科学
座谈会”及其演进……谢立惠(751)
- 第一次科学考察柴达木盆地
纪实……朱新德(755)

医药卫生

- 孟河丁氏三代名医……何时希(760)
- 医林一树——记名中医张
简斋……于易(765)
- 忆施今墨……祝湛予(770)
- 先师孔伯华先生……马龙伯(773)
- 忆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杜孝贤(779)
- 献身医学事业……洪式闾(784)

张孝骞与湘雅医学院·····	周文斌(788)
儿科专家诸福棠·····	萧 集(792)
我的前半生·····	黄家驹(798)
我们的夜班护士	
生涯·····	邵莲英 邵桂英(812)
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吴阶平(818)
几度沧桑话病案·····	马家润(824)
协和医学院的建筑及其他·····	陶世杰(830)
盛京施医院创立纪实·····	刘仲明(835)
我和湖北省立医院·····	杨光第(841)
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	
业的演变·····	金宝善(844)
旧卫生部组织的	
变迁·····	傅 惠 邓宗禹(851)
抗战时期的红十字会救	
护队·····	董民声(862)

体育运动

奥林匹克旧事·····	董宇义(865)
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	

始末·····	刘长春(880)
1936年中国足球队出征奥运	
会的经过·····	孙锦顺(893)
远东运动会在上海·····	施礼康(896)
东北体育活动的回忆·····	刘长春(902)
交通大学半世纪体育风云·····	王道平(906)
南开“五虎”鏖战南北·····	王锡良(911)
忆大连隆华足球队·····	罗仙猷(917)
球王李惠堂·····	蔡扬武(922)
上海乒乓球运动的兴起和	
发展·····	宗锐球(926)
陆礼华与两江女子体育专科	
学校·····	吴志明(931)
棋坛忆旧·····	谢侠逊(935)
解放前三十年间之华南象	
棋界·····	邱秉棣(939)
吴清源的围棋生涯·····	吴景略(951)
清季广东的武馆·····	莫孝同(963)
四川武林和我的习武生涯·····	彭元植(966)
武术家王子平·····	王菊蓉(976)

张孝騫与湘雅医学院·····	周文斌(788)
儿科专家诸福棠·····	萧 集(792)
我的前半生·····	黄家驹(798)
我们的夜班护士	
生涯·····	邵莲英 邵桂英(812)
用医学生的眼光看协和·····	吴阶平(818)
几度沧桑话病案·····	马家润(824)
协和医学院的建筑及其他·····	陶世杰(830)
盛京施医院创立纪实·····	刘仲明(835)
我和湖北省立医院·····	杨光第(841)
旧中国的西医派别与卫生事	
业的演变·····	金宝善(844)
旧卫生部组织的	
变迁·····	傅 惠 邓宗禹(851)
抗战时期的红十字会救	
护队·····	董民声(862)

体育运动

奥林匹克旧事·····	董宇义(865)
我国首次正式参加奥运会	

始末·····	刘长春(880)
1936年中国足球队出征奥运	
会的经过·····	孙锦顺(893)
远东运动会在上海·····	施礼康(896)
东北体育活动的回忆·····	刘长春(902)
交通大学半世纪体育风云·····	王道平(906)
南开“五虎”鏖战南北·····	王锡良(911)
忆大连隆华足球队·····	罗仙根(917)
球王李惠堂·····	蔡扬武(922)
上海乒乓球运动的兴起和	
发展·····	宗锐球(926)
陆礼华与两江女子体育专科	
学校·····	吴志明(931)
棋坛忆旧·····	谢侠逊(935)
解放前三十年间之华南象	
棋界·····	邱秉棧(939)
吴清源的围棋生涯·····	吴景略(951)
清季广东的武馆·····	莫孝同(963)
四川武林和我的习武生涯·····	彭元植(966)
武术家王子平·····	王菊蓉(976)

社会科学

严复先生及其家庭

严家理

清 贫 的 家 庭

严复，福建省侯官县阳岐乡人，1854年（咸丰四年）1月8日生。初名体乾，入马江船政学堂时，易名宗光，字又陵，后又字几道。父祖两代皆业中医，设医寓于福州南台苍霞洲。他的父亲振先给他启蒙教育，7岁时进私塾，9岁回乡在胞叔厚甫私塾读书，11岁再至省垣，师事义序黄宗彝（少岩）。黄是个宿儒，著有《闽方言》一书，熟悉明东林掌故。他因平日求医，与严复的父亲成为好友。黄督课很严，所授不限于经书，但有抽大烟癖，严复日课毕后，常侍坐烟榻之侧，饱聆老师谈说宋、元、明学案及典籍，为尔后寻究学术打下基础。13岁时，黄少岩先生去世，病重时自荐其子孟修来家就馆。孟修幼承父学，此时已中了拔贡。教学未及一年，严复结了婚，接着父亲死了，家贫无力延师。

严复秉承父母之命与王家结亲。王家素慕其父振先先生的医术，遂以女配之。1868年春间完娶。同年6月，振先因抢救霍乱病人，受到传染，不治而亡。振先先生国学造诣很深，幼从其父学医，富有临床经验，所以自他继承父业之后，声名鹊起，有“严半仙”之称。当时南台岛一带乡人遇有疑难病症，无不踵门求医。据前一辈老人谈述，振先为人疏财宽厚，对于穷苦人家急症求诊的，从不计较报酬。他每天出诊各乡，途中须经过一座石桥，附近贫苦病人经常群集桥头，等着他的轿子到来，请求施诊，后竟成惯例。对于无力买药的人，他常常代付药费，有还就收，不还也不索讨。但他好赌博，时时进出赌场，由于赌术欠佳，有赌必输，结果弄得囊空如洗。当时南台岛各乡人家有发生急症的，常常雇轿昼夜来请他，到他家找不着，只得将轿子抬到赌场。有时正遇他输得无法脱身之际，病家只好替他理清赌债，拥他上轿而去。

严复父亲死时，家里当尽卖光，还有余债，如何经办丧葬，确实难为了严家母子。他们在乡里没有一块田产，亲族中也没有谁肯借钱给他，幸好其父生前的病家，闻讯纷纷送些钱来，才解决了困难。当时好事者中还流传说，振先原是“医仙”，死后100天内那灵前的香火，还可以治病。因此许多无知的乡民都来请香火，照例送些香火费给遗属。

父亲死后，严复和母亲陈氏、妻子王氏以及两个妹妹因生活难以为继，只得捱挡一切，全家搬回阳岐乡居住。在上岐一处狭窄河边，有祖遗房屋一座，他们分得两间住下，由母亲和妻子替人家绣花缝纫，得些工钱来维持生活。两妹此时年仅十二岁，其妻王氏也只有十四五岁。严复平生对幼年丧父的回忆，一直是饱含酸楚的。民国初年，他曾为周养庵（肇祥）的

《篝灯纺织图》题了一首诗，诗的前半段是：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贖钱不充债。陟冈刚无兄，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富贵生死同，饱闲亲知恣。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

这是当时情况的写实。

进 身 海 军 界

严复一家搬回家乡居住还没有几个月，船政大臣沈葆楨在福州创办的船政学堂招生，考取者衣食住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还可以领到4两纹银的津贴。当时一般子弟以猎取功名为目标，多半不肯报名应试。严复以家境窘困，前往报考，他母亲和妻子也都认为这是一条出路。考生除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外，还须有个绅商出具保结。严复出身卑微，家庭与官商向无交往，只有他的胞叔厚甫是在乡举人，恰是“乡绅”身份，母子就去求他。不料这举人怕惹事，竟无情地予以拒绝。幸亏族中有个前辈给他们母子献个计，说厚甫是你们的胞叔，三代直系，祖宗相同，可瞒着他将三代名讳职业和厚甫本人功名经历照填保结，加上他一个私印呈送上去。若有对保查询，他是胞叔，怎敢当众否认。母子就按这个办法做了。据说后来此事终被这位举人发觉，曾破口大骂，扬言要具禀退保。母子为此痛哭跪求，才告平息。入学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新蒙丧父之痛，作了一篇情文并茂的论文，得到沈葆楨的激赏，以第一名录取入学。入学后，他按月将4两纹银的津贴，以2两供应家庭，2两留着自用。他和家庭勉强过着清贫的生活。22岁时生长子璩（号伯玉）。

1871年严复以最优异的成绩从马江船政学堂毕业，派在“建威”帆船任练习生。这一年我国船政局自制的“扬武”军舰下水，严复调到该舰练习，遍历国内及日本各重要口岸。1877年，被派遣赴英留学，先进抱士德学院，后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1879年学成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严复任学堂总教习（相当于今之教务长），以道员吴仲翔任总办（相当于校长）。按当时官场惯例，总教习之类官职须以具有府道资格者充任，严复当时官阶仅是都司，但负学校行政及教学的实际责任。1889年，他报捐同知，经过海军保案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派为会办（相当于副校长），第二年提升为总办。1892年又经保案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李鸿章对水师学堂期望甚殷，责成严复悉心整顿，事繁任重。但他总感仕途蹭蹬，心中郁郁不乐，准备着手介绍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照他向所主张的“信、达、雅”三个标准，从事译述工作。在此期间，他连续三次科场失败，后于1893年返闽，应光绪癸巳乡试，希望博得一第，变为科举出身。正如他的长子伯玉在《侯官严几道先生年谱》中所述：“府君自游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守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其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但遗憾的是，第四次科场又失败了。前此，他失去夫人王氏，中年失偶，加以国事螭蟥，自己又怀才不遇，用心益苦，神力交瘁。

严复生前旅居在外，除乙酉、癸巳两次回乡应试外，一直奉母并携妻子（王氏死后，继娶江氏，又娶朱氏）住在天津。阳歧乡严氏族人过去读书的极少，多数是自耕农和手工业者，

只有一两家开设小酒店或油盐店。自严复任职天津后，弟侄辈由于他的关系，出外就学的才多了起来。庚子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严复全家由天津避难上海，那时随行的除了堂弟又甫外，还有族侄伯璠、伯勋、家井、培南及阳歧同乡毛姓青年等。伯璠曾留美专攻数学，后任唐山大学数学系教授、山西盐务管理局局长、福建盐务管理局局长等职；伯勋后来加入同盟会，曾和汪精卫等人谋刺清摄政王，北伐后在国民政府海军部任上校科长；家井在京津开设“一和洋行”，经营铁路枕木及五金、纸张等进口业，发过大财，后因北洋军阀失败被交通部拖欠大批款项无法收回而宣告破产；培南以数学见长，民国元年严复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聘他为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这些人大多是远族。他们随严复赴津时还都是青少年，均被安置在武城学堂肄业。由于这些人互相援引，族人就学就业于京、津、沪各地以及海军和铁路的，不断增多起来。至于和严复年龄相若的弟兄，则被荐入海军舰艇工作。但他们都因幼年失学，识字无多，知识有限，只好做枪炮生或伙夫之类的杂役。阳歧乡地少人多，平均每人占地仅6分（阳歧土地向以6分为单位，称为“一工”）。自耕农受到土地限制，生活极端贫困，一遇天灾人祸即无所措手足。由于严复及其同乡弟子的援引，离乡外出的人日多，由同族扩大到同乡，后来在外的人远较在乡的为多，有些人在外已历数代了。

治学严 待人宽

严复治学严谨，每晚他以打牌为消遣，散局后，照例要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或写作，至午夜始息。1895年译成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论》。此书原为授课之用，后公开行世。此书用进化论观点论述人类社会的演进，对当时中国思想界震动很大。以后又有大量译述行世。他对后辈的要求也很严格，无论读书写字，都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反对躺着读书，歪欹写字，衣服要洁净，用具要排列整齐。并常以“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来告诫后辈。他提倡按部就班地学习数学，认为数学不仅是研究自然科学不可缺少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数学，可以训练思想，使之条理化。他曾说，学过数学的人，尽管后来全忘掉了，但因头脑已得到了训练，谈话、写作和推理时就不至颠倒紊乱。一次，他的三子叔夏写信向他陈述在福州的读书情况，说正在阅读《近思录》，并准备用七年时间读毕二十四史及英文世界史云云。他复信说：“甚好，但此书不是胡乱看得，非用过功夫人不知所言着落也。二十四史及英文世界史尽七年看了，‘先生之志则大矣’（引《孟子》），苟践此语，殆可独步中西，恐未必见诸事实耳。但细思之亦无甚难做，俗谚有云：‘日行，不怕千万里’，得见有恒则七级浮屠终有合尖之日。且此事必须三十以前为之，四十以后虽做亦无用，因人事日烦，记忆力渐减。吾五十以还，看书亦复不少，然今日脑中岂有几微存在？其存在者依然是少壮所治之书。吾儿果有此志，请今从中国前四史起。其治法由史而书而志，似不如由陈（《三国志》）而范（《后汉书》），由班（《汉书》）而马（《史记》）。此顾虎头所谓倒啖蔗也。”（按：晋顾恺之字虎头。）他认为无论从事哪一门学问，都要有真正的知识，反对出言无实，陈腔滥调。叔夏少时有一次评介某青年诗人的作品，说嫌其太滑。先生曾就此发挥说：“言其滑，固然。但请问诗如何然后为滑？夫滑者，徒唱虚腔而无作意之谓也。诗有真意便不为滑。使无真意，学东坡固滑，学山谷亦滑，江西派乃更多不耐恶调也。”他晚年时，子女除叔夏留闽外，其余都在他身边，他和叔夏经常通信，要叔夏经常写家信，并答应他有信必复。叔夏写信署的日期，有时用公

历，有时用旧历。他就在回信中指出：“刻下新旧两历并行，凡作家信，用新则纯新，用旧则全旧，不可乍阴乍阳，必致迷乱误事，汝前书皆用旧历，此信乃忽填新历日子何耶？又如朔、望、弦、晦及初几等字，皆旧历有之，不宜以书新历。”严复还经常告诫乡族子弟，不要游手好闲，不可作不务正业的情民。他对有力而懒惰的人如乞丐、流氓以及僧道之流，都视为“国之情民”，决不施舍分文。而对于无告的孤寡，却深为怜恤。1919年我父亲去世（他生前由海军炮手升至长江南北岸炮台台长），死时已欠饷多月，薪俸恤金都支领不到，索债临门，无法应付。翌年，严复回闽终老，见到我时，老泪横流，当即写一信给福建督军李厚基，述说我家寡母孤儿处境之苦。李厚基之任福建督军，是由海军总长刘冠雄荐于袁世凯的，而严复是刘冠雄最尊敬的一位老师。李接信，立即派人将款送来，清了债务。此时他还两次查问我的课业，并亲自教我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和王勃的《滕王阁序》。

严复在家内颇能纳言。一天，他的一只专用饭碗（精美细致，可能是个古董）被仆人不小心打破了，他顿时发起火来，斥责仆人，唠叨不休。他的次女璆（当时才十五六岁）见状，反问他：“大大（子女对他的昵称），天下有没有不破的磁器？”他顿时改容，不再说什么了。事后还着实夸奖这个女儿能“规父之过”。他对孩子们所表现的某种率真的举动，也会采取谅解的态度。例如，一个冬天的晚上，他的四儿璇（16岁）晚饭后踱进父亲书房，见案上放着一函《金瓶梅》（明版，共有三函），便倚案看了几页，心里有些不自在，暗想：这莫不是坏书，父亲为什么看它？便一声不响地把书扔进房内取暖的煤炉里。先生在外屋（正在叉麻将）发现有烟雾漫出，便向房里喊话，但不见回应（严璇已一声不响地溜走了）。我在北京读书时，发现先生放在书橱中的《金瓶梅》只剩了两函，一直不解短缺一函的原因，至后来严璇自国外回来对我说了上述的这件事，我始明白。严璇说父亲对此事后来并未追问责备。

晚年思想倒退

严复晚年思想开了倒车，列名“筹安会”，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来送严璇去唐山大学肄业，时值五四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他却对儿女们提出青年不要过问政治的主张。在《书示子璇四十韵》诗中云：“内政与外交，主者所宿留；就言匹夫责，事岂关童幼。”他曾说五四运动是“举国方饮狂，昌披等桀纣”，斥之为猖狂的举动。他主张婚姻要遵古制，认为婚姻的目的，主要在于“承祭祀，事二亲，延嗣续，故必须承父母之命”。他对自己子女婚姻也按此办理，致使长子璩（伯玉）和三子璉（叔夏）都因包办婚姻而受到终身痛苦。其他子女都在严复死后才结婚，次女华严因信仰天主教进了修道院。

严复早年相信“人定胜天”的道理，但对宗教、鬼神、命相、卜筮等事，却半信半疑，态度暧昧。从他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出他对佛教所持的观念。他写道：“无惧真为宝，非兹不得生。禅门讲座下，所得尽平平。国破犹能战，家亡尚力耕。升天成佛者，皆是有牺牲。”一次，伯玉为亡母王夫人忌日在北京法源寺设奠做道场，其弟严璩、严玷不肯接受和尚的使唤，不愿行跪拜礼，还说了一些牢骚话（受五四运动影响，反对封建迷信）。伯玉心中不快，写信到上海告诉他的父亲。严复即去信给璩、玷两子，大意说：凡事在还不能证其必有、也未能断其必无的时候，只能取存疑态度，不应简单地给予否定或肯定。做道场失礼，说明你们无知。信中最后说，此类事须“均衡判断”，“之所以难能可贵者在此”。我还听家人说，庚子义和团

事起的那年，严复由天津逃出，避地上海。他的次子璩于途中染病，由跟随的人轮流抱着逃难，奄奄一息，杯水难寻，在极度慌困的时候，严复时而喃喃念佛，时而向菩萨许愿，时而又静默祈祷上帝保佑。严复究竟崇奉的是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出，只是在无可奈何之际找个精神安慰罢了。他有个族弟彬亭，供职于海军界，以占卜著名。彬亭身故之后，严复在给三子叔夏的信中感叹道“从此无起课最灵人矣”。他63岁添孙，闻讯喜不能寐，立即悬灯燃烛，焚香拜祖。类似举动，不一而足。1917年6月1日，天空有一颗新星出现于牛女之间，光芒焕发，过于一等星。他明明懂得“自晚近星学家言之，固若无与于人事”，可是接着又说，“而其所可异者，独见于此时而已”，并吟出“可是耶和（指上帝）欲现形”的句子来。

怀恋阳歧故乡

严复对故乡极为留恋，他到66岁才得重返故乡。在此之前，他曾有《怀阳歧》一诗，表达了他对家乡景物的怀念。这首诗是：“不返阳歧廿载强，李垞依旧挂斜阳。鹅头山好浮佳气，碣角风微簇野航。水鸟飞来还径去，黄梅香远最难忘。何从更作莼鲈语，东海如今已种桑。”他居北京时，还有“长安作客垂十年，梦想阳歧山一逻”的诗句。他和王夫人的墓，就选择在鹅头山。这块墓地是其长子伯玉在清朝任福建财政正监理官时为父母卜择的“牛眠”之地。伯玉亲自监督营建了这块墓地工程，到1912年底才将他母亲的灵柩安葬在这里。严复因事未得回闽，亲自写了“清严几道先生寿域”一块墓碑，直到他回福州，才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圻。

王氏葬后，先生就想回家看墓，尤以“洪宪”失败，因有声名之累，居常抑郁寡欢。1916年除夕，寄陈石遗一首诗有“乡思如潮不可减”的句子。他回福州后，经常居乡，住在我家。居乡时经常拄杖在桔林河边散步，和父老们谈家常，讲农事。乡人求字，有求必应。当时阳歧有一家“福记”杂货店，因为先生在乡，竟由福州采办一批宣纸回乡应市，一时传为佳话。

在阳歧乡，他向乡人请求，倡议重建“尚书祖庙”，庙祀南宋参政陈文龙（南宋殉国忠臣，宋史有传）。他为建庙捐了1000元。督军李厚基以和他的关系，也捐了3000元，严复并为该庙撰写了许多楹联。庙门横额“尚书祖庙”四个大字，是他亲题的。倡建新庙的本意，只是鉴于阳歧乡地少人多，群众生活困难，通过营建庙宇工程和以后赛神演戏等事，可为本乡群众增加一些收入而已。这个庙里的神，是南台岛渔民最迷信的偶像，每年各乡渔民都要来阳歧祖庙进香祈福。

严复于1921年逝世，时年67岁，诸子均未在侧，仅次女华严随侍。遗嘱除对财产作了分配外，并以三事敦嘱家人：一、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等语。据闻他生前经常与人谈道：“老夫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之八九殆与前不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并说：“吾垂老亲见七年的民国，与欧洲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

严复的墓志铭，为其挚友陈宝琛所撰。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胡适之曾和我说过：“以几道先生在近代学术文化上的贡献，绝非清代遗老如陈宝琛辈所能窥测想象。伯玉以墓志铭之作，委诸陈先生，殊不可解。”解放后，严复的鹅头山坟墓，经人民政府出资修葺一新，列为国家文物，予以保管，传留后代。

略谈辜鸿铭

沈来秋

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福建同安人，1857年（清咸丰七年）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928年病故于北平。早年留学英国，毕业后遍游德、法、意、奥诸国，精通西方各国语言，包括希腊文、拉丁文在内，为我国翻译界早期著名人物之一。他与严复、林纾二人同时，但不同道。严、林二人以汉文译外文，把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辜氏是以外文译汉文，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西洋人，思想上对于西洋的物质文明是有所批判的，并且认为西方民族的富强来由于战争和掠夺，所谓“文明”，流弊无穷，应当吸取中华礼教的优点，用以补救。

晚清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士提倡变法图强，西方改良思想源源输入中国。同时西方人士也正想对中国古代的文史和哲学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辜鸿铭的译作和言论正能适应他们的需要，因此辜氏在欧洲文化界所得到的评价远远超过在国内所得的声誉。

辜氏久在欧洲留学、工作，归国时已年近三十，其时，他已通晓多种外文，但对汉文仍不甚了了，于是决心从头学起。他把《康熙字典》作为初学的课本，努力自修，很快就入了门。他对中国旧文化有独特的爱好，主张“以华变夷”。他以思想上和当时的维新运动背道而驰而被人称为“怪物”。他研究中国经典书籍，不受旧传统注疏家的拘束，每每别有见解。例如他用英文翻译的“四书”，就没有完全采用宋儒朱熹的原注，常常自己别创新意，加以解释。此外他还译述《春秋大义》和《礼制》诸篇，在当时的中西文坛上颇为著名。

一、一个顽固的保守人物

我对辜氏有所知，是从1910年开始的。那时我和他的儿子辜守庸（字志中）在青岛大学（中德政府合办）同学，我在预科五年级，他在三年级。上“哲学入门”课时，讲师赫善心博士（奥国籍）提到辜鸿铭的名字，说他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我们全班同学都说不知道他。博士于是反问：“他的儿子也在校中学习，你们为何不知道？”后来我们便问辜守庸，他的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为什么外国教师这样推崇他。辜守庸把他父亲所著的《张文襄幕府纪闻》上下两册介绍给我们看。我们读后，觉得内容很平常，看不出著者有什么出众的学问。直到10年以后我赴德国留学，在那边读到辜氏一些德文版的著作，结合对他的所闻所见，才逐渐明白为什么很多外国人这样崇拜他。

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后，青岛大学学生纷纷自动剪掉发辫，这时武昌起义尚未爆发，学校当局虽然不赞成学生的举动，但也无可奈何。我们福建同乡十余人劝辜守庸也参加行动，但他以未得父亲许可而未行。武昌举义后，校中只余少数学生还拖着辫子，这些人多半是清廷大官僚的子弟，辜守庸便是其中的一个。不久辜鸿铭从上海避居来青岛，他拖着大辫子，以遗老自居，反对革命，大谈其保全清室的大道理，有人斥他为“宗社党”。那时青岛为遗老的

通逃蔽，他们托庇于德国人势力之下，纷纷在这里租地盖屋，以为可作世外桃源。辜鸿铭亦在其中。他喜欢发表惊人言论，骂人骂世，却不是政治活动家。

当时，青岛有一所礼贤书院，系德国牧师尉礼贤（Richara Wilhelm）创办的。尉 25 岁从德国来到山东时，就勤修中文，一面传道，一面研究中国经史诸子百家，这时期与辜氏在青岛成为密友。辛亥革命以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尉礼贤有系统地把中国经典书籍译成德文，同时也把辜鸿铭的思想介绍给德国人，并大加颂扬。尉礼贤后来回国，从 1924 年起任德国佛兰府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辜氏于 1917 年应蔡元培之聘，入北京大学任教授。约在这个时候，我在北京东安市场的小馆子里见过他，那时他正神采飞扬地和几个中年朋友高谈阔论，头上已没有了辫子。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关于他的种种趣事（如有欣赏女人小脚之类的怪癖）并引为笑谈。在政治方面，他对于时局极端不满，经常发表尖锐的批评。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人物），有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中国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诸如此类，足见其狂。

当时正是欧洲大战时期，德国节节胜利之时，辜氏就已预料到德国最后必定失败。他以为，德国在战场上虽然成功，但内部将发生危机，因其国内工人革命运动有长期的历史、潜伏的力量不可忽视云云。在中国他有许多西方朋友，他们遇有争辩不能解决的问题时，都说：“我们去问问辜鸿铭是什么意见，请他来判断。”辜氏独特之处，在于他对于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来源，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和西人辩论时，能够旁敲侧击，广引西洋的经典作为论据，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无话可说。他在西方人士中享有盛名，原因就在此，他曾被张之洞引用办理外交之事，其原因也在此。

辜氏曾娶过日妇，其子守庸系日妇所生，这是守庸自己亲口告诉我的。守庸与我同学时，英语已有相当的根底，并且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据他说是由他的母亲传授的。其母死后，他就不愿多弹了。辜鸿铭兼通日语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但他娶日妇之事，则一直是一个秘密。

辜鸿铭自出国留学以后从未回过家乡，所以乡人知道他的很少。他取名“汤生”，这是外国名字的译音。

他的一生，就我所知道的，庚子前后是他的黄金时代。辛亥以后，他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势的发展，在国内的声望逐渐下降。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他在欧洲出版界中却占有一定的地位。他不失为一个具有卓越才能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大家只知道有严复和林纾，而很少有人提及辜鸿铭，实在是个缺憾。

二、庚子时期的政治态度

庚子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役，当清政府宣战的命令传布之后，北京已处于无政府的状态之中，南北交通断绝，各国驻华公使被困在北京，对外不能自由通讯。这时上海成为外交中心，驻上海英国总领事华伦成为各国领事的领袖，他们在这种形势之下，作了紧急部署，一方面将海军兵舰驶入吴淞口，令海军陆战队登岸布防，在租界戒严，随时注视南方各省的动态。一方面为阻止义和团向南方发展，保全列强和清室官僚在南方的利益，由华伦策动两江

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实行“东南互保”。刘坤一在接受英使的示意后，把“东南互保”的办法电商张之洞，得到张的同意。那时辜鸿铭是张之洞的高级幕僚，由于他擅长外语，且喜欢和外国人辩论并态度强硬，张之洞就利用他办理外交事务，委他代表自己由武昌到上海协商此事，并拟由他出面和英国总领事打交道。辜氏到了上海，见人就发表意见，他先骂外国人不应该欺侮中国人，认为义和团的事完全是由外国人压迫中国人所引起的。他说洋人被仇杀，其责任应由洋人自己负担。他还骂教堂、骂教士，说这些都是导致祸乱的原因。他反对洋教，也反对变法，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维护法统的一贯主张。

他第一次和英国总领事晤谈，谈了一个钟头，还没有谈到交涉的本题。对方是久闻其名的，只得耐心静听他对于时局的意见。等他说完之后，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于是约第二天再谈。到了第二天，他一见面又是一大套议论，英国总领事先是耐心地听着，但过了一小时后，实在耐不住了，于是开口说：我们已经谈了两次，还不曾接触到所要谈的问题。你所说的，都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急要商量的，是善后的办法。辜鸿铭说：“我谈了两次，是要你先得承认我的话有道理，然后我才能把善后的办法正式提出来和你商议。”于是乃约下次再谈。

第三次见面时，辜鸿铭把世界大势，各侵略国在对华问题上的明争暗斗，以及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述说了一番。英国总领事本来是一位外交老手，忍耐力很强，对于辜氏责骂洋人和教士，也不加以争辩。双方会谈取得了结果，接着订立了《中外互保章程》，其主要的内容是：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由各省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保全中外商民的生命财产等等。就这样，南方的局面便“稳定”了下来。

当李鸿章奉令为议和全权大臣到达天津之后，原以为双方即可开议，岂知代表联军方面的各国外交官，经过几个月之久，还不能提出具体的议和条件（彼此之间意见分歧，各自为谋，难于一致）。此数月中，中国方面日夜担心，不知将被他们如何宰割。这时辜鸿铭用英文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尊王篇》，在维护封建法统的前提下，引证孔子的春秋大义，斥西方各国的行为为不义。谓中国以礼教治国，忠君爱国之情源远流长，以致今日人心仍然拥护王室，统治根基并未动摇，虽然中间曾经过太平天国的反抗，但最终仍然平定下来。他发表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外为封建王朝打气而已。此文颇为当时中外舆论所注意，对和议的达成，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向欧洲鼓吹东方文化

1920年2月，我从巴黎经瑞士到了柏林，在柏林住了几个月，就到卜勒门市一个造船厂实习，之后，在东海滨避暑度假两星期，于是年10月考入德累斯顿大学。到德国的第一年，我走过不少城市，接触过不少社会人士，包括劳动群众。他们一般都对中国人表示好感，对东方文化感到兴趣。出乎我意料的是，辜鸿铭的名字竟为许多人所知；细加探究，终悟出了一些原由。

巴黎和约对战败的德国所规定的条款，是相当严厉的。一般德国人认为接受了停战的协定，是受了屈辱。他们一方面极端厌战，祈求此后永久和平；另一方面以心有所不甘，仇恨西方列强，并且对西方文明发生怀疑，于是对东方的哲学和宗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辜鸿铭

的著作便应运而出现在各个书店的窗柜之间，和它相陪衬的，还有尉礼贤关于中国经典的译著，如《论语》、《孟子》、《周易》、《老子道德经》之类。

辜氏的著作，原多半是英文版，译为德文后，由德国文化界名流作序予以介绍发行。辜氏在其著作中对西方的一切都加以批判，英国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论著亦在批判之列。他目光敏锐，立论犀利，得到一般读者的好评，尤为德国的读者最为快意，因无异于替他们吐出胸中不平之气。

辜氏著作的另一面，是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礼教和社会秩序加以鼓吹，认为其“足以补救西方文明之弊病”，这也切中战后德国人苦闷的心理，促使他们向东方寻求精神上的出路。1920年，在柏林的中德人士经常举行交流两国文化的集会。一为“友好会”（大战期间已成立，战后仍继续进行），主持人为中国留学生，并得到许多爱好中国文化的德国人士的赞助；另一个为“东方舆论社”，以到过中国的德国人为骨干，发行定期刊物《东方舆论》。后来这一类社团有所发展，并推广到其它城市。这一时期，德国人士认为，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辜鸿铭，另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但泰戈尔只是一个诗人，而辜除了是哲学家、文学家之外，还是一个政论家，对于德国的基本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彼时中国的社会知名之士，如蔡元培、梁启超等都到欧洲游历，蔡元培并且曾在德国留学过，但德国人对于他们的态度，一般是冷淡的，认为他们只是为了吸取西方文化的糟粕而来的，是卑不足道的。

这时，我接到国内寄来的一册《东方杂志》。在《国际消息》栏内，载着一则柏林通讯，大意说：中国一位学者郭君的著作，大受德国人士的欢迎……云云。原来这个消息是从日本刊物转载而来的。辜氏德文的译名为 Ku，日人不知中国有辜姓，《东方杂志》的编者以讹传讹，竟称之为“郭君”，其实就是那时尚在北京的辜鸿铭，只是他的声誉在国内相当不济人望。

四、辜氏的著作及其影响

关于辜氏的翻译作品和论著，除上面各节已经提到的之外，在德文和汉文方面，就我曾过目的且现在还能忆到的，介绍几种于下。

（一）《张文襄幕府纪闻》，汉文铅印本，分上下两册，宣统庚戌年中秋刊行，著者署名为“汉滨读易者”。全书以笔记体裁写就，叙述作者当幕僚时之所见所闻，并发表一些独特见解，诙谐笑骂，无所忌惮。读之，可以看出作者顽固保守的一面（读者常感莫名其妙，有隔世之感）。此书为著者平生汉文著作仅见的一种，在国内各省图书馆中容易寻到。

（二）《中国对于欧洲思潮的反抗》，德文版，1921年在德国出版，由 A·Paquet 作序。这本书可算辜氏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有一段话，说他在中国和一些人一道评论当时在上海的华人和西人的道德标准问题时，有一个英国人说，这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来衡量。辜说这种“立场哲学”完全是英国人的生活方式。每一个英国人对于宗教和道德问题，不但有自己小小的见解和自己的立场，而且不承认世间上有正确和错误立场的区别。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在中国永远无法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还举《伦敦泰晤士报》某一个作家的言论为证，说明英国人对其他民族思想的想法。对于中西文化标准的问题，他说了这样的话，其大意是：诚然，物质生活的程度，可以作为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的前提；但是，不能认为物质生活就是

文化。一个民族的生活水平由于经济的原因，可能在下降，但是不能就因此证明他们的文化也在下降。这一类的话，对于战后的德国人，是说到他们的心坎里，不会无所反应。

(三)《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战争的出路》，由Oscar A·H·Schmitz译成德语，1916年在德国出版。此书写于欧洲大战期中，内容为寻求欧洲未来和平的解决方法。书中对于中国儒家的礼教，给以极高的评价。辜对西方文化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但他认为中国的文化较西方为高。在欧战期中，他把中国的孔子之道推荐给西方人，认为这是“贤人的宗教”，可以把欧洲从战争的困难情况中拯救出来。

(四)《怨诉的声音》，1921年在德国出版，是汇集几篇论文的合刊，原名用拉丁文“Vox Clamantis”，不加以德译。辜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中国古代“贤人政治”的理想，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说法，认为“法治”是不足恃等等。

辜鸿铭的著作在德国文化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我所接触过的德国教授在讲课中提到中国问题时，总是说：“中国有它自己的文化，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眼光来误解它。”又云：“欧洲人对中国欠下种种血债；在中国人已经掌握了高度文化的时代，欧洲还为一些野蛮民族所聚居。”等等。大约在1923年至1924年之间，德国史朋格勒(Spengler)的名著《西方的没落》出版了。史氏是一位中学教师，他用比较的方法，拿中国古代战国七雄时期和战后欧洲各国的形势作对比，认为西方文化正处于走下坡路的趋势。此书一出，轰动一时。

庚子期间，德皇威廉二世提出“黄祸”之说，当时一般西人对于中国民族的反抗精神有了初步的体会，但不承认中国具有高度的文化。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欧洲中心的德国，不但承认了中国有高度的文化，而且承认西方有向东方学习的必要。持这种思想的人我遇见不少。有一次，我在旅行中和一位德国人交谈，他知道我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便很诚恳地说：“关于这一类的学问，你们所知道的比我们好得多，在我们这里学不到什么。”对西方文化的厌倦心情溢于言表。

文末附带说一说辜氏对青年一代的态度，以助更多地了解他的思想。

在青岛时，我们一些同学到他家访他，他问我们“朋友”是什么意思？继而广引“四书”中有关朋友的章句，向我们作了一通说教。他实在是个“四书迷”。他曾反对废科举，并且说能做八股的人具有大本领，可是他自己想学做八股而无成。

五四运动前后，福州人林某的孙儿在清华毕业后将赴美留学。林某与辜氏为老友，林携其孙往见辜氏，云将赴美学习商科。辜闻言，大加反对，谓书香门第竟允许乃孙出国学做买卖，实为莫大的耻辱。他随即口诵“四书”一段，要林某之孙译为英文，结果认为英文程度尚好，学商则太为可惜云云。

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

黄伯易

我在旧制中学曾读过康有为、梁启超不少文章，随着时代转移，思想也起着变化，然而对这两位近代史上曾起过启蒙作用的大师始终怀着敬仰之情。1921年，我在南京进了东南大学。听说梁启超受聘清华、燕京作教授，住在清华园，闭门看书，不问政治，我心想他真是无比清高。1922年夏初，我一到学校就听到梁启超、杜威、胡适受聘到南京讲学的消息了。

梁启超在国立东南大学主讲《先秦政治思想史》，先后开班两次，都与我的生物系必修课程时间冲突，连去旁听都不可能。然而因其他关系，我同他接触的机会倒也不少。令人惊异的是，在当时“自由讲学”的讲坛上，如胡适、张君勱、江亢虎、张东荪等，都大谈政治，大谈主义，而像梁先生那样在政治上几度活跃的人物，却对当时的政治绝口不谈。有一次我向他提起，他说：“我在政治上经过几次风险，现在决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你难道不能理解？”从他当时庄重而又矜持的面容上看，梁启超显然已经失掉他发出“死生不过开阖眼，祸福有如反覆手”壮语的青春时代了。

东南大学的“自由讲学”时期

国立东南大学的校牌是1921年7月挂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门口的。当时中国只有两所国立大学：一个是蔡元培为校长的国立北京大学；一个就是号称“东南最高学府”的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在当年8月份补行开学典礼的讲坛上说：“我一定要永远保持住南京学生的优良传统——埋头用心读书，不问政治……”这话博得了在台上的督军齐燮元和省长王瑚的嘉许。哪知郭校长在北京跑了一趟回来后，竟主张“自由讲学”，并延揽国内外的许多名流学者，不分党派，利用这个最高学府讲坛，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让学生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并强调说：“这是德谟克拉西民主精神，是美利坚民主的讲学自由风气。”他们仿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筹办暑期学校，事前在京、津、沪、汉的报纸登了广告。其简章规定，凡大学生来暑期学校肄业的，每人可选八个学分的课程，由东南大学发给修业证明。这个暑期学校的学生和旁听生，不下2000余人。学生来自全国，只缺蒙古、新疆、西蒙。还有两名来自朝鲜。担任暑期学校课程的教师，除原有权威教授外，还有海外和国内知名之士，计有：美国杜威博士讲授《实验教育哲学》；美国孟禄博士讲授《教育学》；美国推士博士专任学制改革；美国吴卫士博士讲授《昆虫学》，美国巴斯德斐尔德博士讲授《农业推广》；德国杜里舒博士讲授《生机哲学》；胡适博士讲授《实用主义》兼杜威翻译；梁启超教授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张君勱博士讲授《政治学》兼杜里舒翻译；江亢虎博士讲授《劳动问题》；张东荪教授讲授《新闻学大意》；曾琦博士、李璜博士所开课程不详。除此以外，还有本校某常务校董和工科教授杨铨开的《政治改造思想》、《乡村教育》等。在“自由讲学”时大会堂添上了一块

用石绿作底的金字匾额，由柳贻谋教授手题了“美尽东南”四个大字。

上列15名教授除在各教室分占一席外，有14名教授（杨铨例外）在大会堂讲坛作过几次（至少一次）专题讲座。此外还延聘了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讲了一次《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世人所必需》，金陵大学校长、美国的包文博士讲了《基督教世精神真义》。8月初，美国经济调查团从上海到南京，还开过一次盛况空前的欢迎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胡适特别强调：“华府会议给中国指出了繁荣的方向，别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以美国为首的四国银行团对中国是雪里送炭，不是锦上添花。”“美国经济调查团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令人感谢发财亲戚远道来看穷亲戚的道义和高谊厚情。”这时的梁启超大讲先秦政治思想，只是令人兴起苍茫万古之感。南京“自由讲学”的政治背景是北洋军阀内阁在亲日派垮台、亲美派占着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对依靠美帝国主义怀着新的幻想。南京的“自由讲学”实际上是中国从摹仿日本学制改变到美国学制的一道分界线。例如张士一教授在暑期学校还开了化学课，下学期就被派襄助推士博士组织教育考察团进行学制改革；在暑期学校举行结业式时，江苏省长王瑚讲道：“我是孔子的同乡，我敢相信孔子若是生在今天，他也要学英文、穿西装，到美国留学。”正说明当时的亲美气氛。

梁启超的充沛精力和学者态度

我第一次见到梁启超，是在暑期学校的欢迎大会上。大会开完，同学们挤到食堂，对大师们的仪表品头论足。有人说想不到杜威不过是一个瘦老头，并给江亢虎的高和胡适的矮起了外号，说胡适不像一个学者，倒像花牌楼的商人。我注意到许多同学对梁启超却具有较好的印象——首先是他的谦虚态度，不似胡适等人讲话那样目空一切。有人学着他夹带云南口音的普通话说：“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攻错。”梁先生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

连续几个星期日，我同几个听课的同学到成贤街宿舍看梁先生。他治学勤恳，连星期天也有一定日课（工作计划），不稍休息。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右手在写文章，左手却扇不停挥，有时一面在写，一面又在答复同学的问题。当他写完一张，敲一下床面，让他的助手到另室取华文打字机的打印稿，一篇还未打完，第二篇稿又摆在桌面了。无怪梁启超是一个多产作家。其实还不止此，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还得摘录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读的日文和中文书籍纵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懒。他好像善于五官并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觉冷漠，反而从他的一颦一笑的问答中流露出热情。他经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同学。在勤恳治学方面，梁先生确是做到了以身作则的。

如所周知，大师们各有千秋，自上而下的“自由讲学”很快就发展到同学们自下而上的自由批评。它肇端于杜威的“真理不可知论”，和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论点，以及张君勱、江亢虎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一切背离理智的问题，都在同学们脑筋里打了问号。对同学们向教授们提出的疑问，杨铨教授都提出正确的或相应的解答；梁启超教授每涉及诸大师的问题，多方回避，甚至表示矜持，以“我不能赞一辞”来作应付。因此引起许多同学在“学者态度”上发出争论。有人主张中国缺乏政治理论批评，真理愈辩愈明，就应大力提倡杨铨

教授的学者态度；也有的同学坚持永远保持虚衷、谦抑自守的学者对政治应守“三缄其口”的戒律，多言多败，认为梁启超教授具有真正的学者态度。两种学者态度的争论很快就反映到成贤街梁先生的宿舍，不过提问题的人很巧妙地避免伤害梁先生的尊严。但他很敏感，立时郑重地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却反对批评的不自由。我的态度同杏佛（即杨铨）并无两样。例如我主张真理是可知的，在我的班上已经说过了。（据我后来查问他曾举出‘天之高也，辰星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定也’来答复同学的疑问）是否正确？我们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胡适讲演的原话，梁对他含有讽刺意味），我也说过同大家一起进行攻错。”这样一说，同学们关于学者态度的争论就从此涣然冰释了。

为学的兴趣与精神上的苦闷

那时南京的大学生出身地主家庭的约占一半，达官、富商子弟约占30%强，小资产阶级约占15%。自从掀起了“自由讲学”的浪潮，眼看西风压倒东风，梁启超自然不会无动于衷，熟视无睹。

盛暑时节，文史两系全体师生假座鸡鸣寺开了一次联欢会。（我原系生物系学生，当时东大仿美国学制，凡总平均分80分以上者可任意选择一个副系，多读四至六个学分，我选读了语文作副系。）一位江苏同学乘梁先生兴致勃勃，向他提出：“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先生顿时庄重地说：“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的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不几天我们听完孟禄博士讲演，就同另三位川、湘籍同学从大学后门绕道去成贤街宿舍，向他报道了中国将全盘仿照美国的教育制度来改变全国学制。我提出这问题要他发表意见。这时鼓楼的小馆正送来他的包饭，他嘱咐伙计快去准备四份客饭，一面指着桌上，带笑地说：“这是一个饭桶，它只是一个装饭的饭桶！凭你把这饭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会改变饭的质量。但中国之大，主张‘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数，让他们去欣赏他们的饭桶艺术吧！”（意指孟禄）说得大家发笑。这时门客正领来鸡鸣寺的和尚，展开用古锦裱好的一副玉板宣对联，要梁先生盖上他的印章说：“小寺一定要把任公的墨宝藏之名山，垂之千古。”这副对联正是我们前几天在鸡鸣寺开会时老和尚要求梁先生写的。在豁然楼上由于对诸子百家问题的感慨，他略事沉吟，便写下了放翁的集句：“江山重叠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正说明不问政治的梁启超，对当时政治变化依然怀着不满的心情。与此同时，杨铨在讲坛上凡讲到形形色色的社会改造思想，对江亢虎、张君勱也提出尖锐的讽刺。于是教授之间也开展了自由批评。

梁启超在南京第一次专题讲座，讲题是《为学的兴趣》。在这次讲演时，听众挤满了一字房会场，超逾预期的效果，不是偶然的。在他讲词的结构上，直接采用了古文《七启》、《七发》的谋篇布局——从批判一切生活烦琐，最后表达出自己的高超趣向。例加：“有人说吃酒有兴趣，醉了怎么样？又有人说赌钱有兴趣，输了怎么样？……把我梁启超烧成灰来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